



作者:孟凡印 姚西萍

2014年出版

盖村史话

【内容简介】>>

《盖村史话》是作者历时近10年,为家乡的村庄立传,是第一部记录盖村历史的村史,是难得的抢救性的历史资料,为子孙后代留下了一笔宝贵的历史和精神财富。

【作者简介】>>

孟凡印,现年76岁,市中心人民医院退休大夫。一生爱好文学,2000年退休后,经常写些散文、诗歌,曾在各类报纸、杂志上刊登过。历时近10年,为家乡的村庄立传,自费出版了书写近20万字的《盖村史话》。

为农民立传功德无量

近日,通宵阅读滕州滨湖镇西盖村人孟凡印与夫人姚西萍女士自编自印了西盖村的第一部史书《盖村史话》,感觉孟先生和他的夫人摸到了农民的脊梁,对曾经共同生活在一起的老少爷们们知冷知热,对家乡非常热爱。孟凡印先生和姚西萍女士为村庄写史,为农民立传功德无量。

该书观点正确,立场坚定,以所见、所闻为主线,大约从1840年写起,写到20世纪50年代,可谓是滕州滨湖镇西盖村的一部完整“近代史”。

作者写到“村民”、“咸丰帝师王东槐时,记述了“太平军北上攻打北京,路过滕县时,便扒了王翰林的坟。”我们在很多材料中,仅知道一代帝师王东槐的坟墓在文化大革命,和前几年铺自来水管道时被扒过,没想到,还被太平军扒过,真是让人寒心。

写到村民、中共滕县第一任书记王临之时,回忆说,“1960年代,农村缺医少药,那年流行伤寒病,当时农村买不到合霉素。我那时候在青岛,王先生给我写信要这种药。我在药店买了五盒寄给他。后来,他回信告诉我,用这个药治好了很多病人,说代表家乡感谢我,并要给我寄钱。我回信说,钱不要了,能为家乡做点贡献,我感到欣慰。”1967年某天,公社卫生系统的红卫兵以党的叛徒罪名想斗争王先生,由于他那天有病发烧,没有斗他。

关于共产党在盖村的影响,作者详细写到:有一年,孟先生(作者祖父)去了南方,听到了关于共产党的事情。回到盖村后,村里人向他打听外面的新闻。孟先生说,南方有共产党在活

动。有人问他什么是共产党。孟先生说,我也不知道共产党的详细情况,只听说共产党是好人,讲道理,为穷苦人着想,穷人没饭吃就把富人的财产分给穷人。西盖村地主某某某听了后很反感,他根本不相信。到了1948年,家乡彻底解放时,地主某某某说,当年孟先生说共产党,我还不相信,光觉得是不可能的事,今天看来是真的,早知道有今天,不如当时把财产拿出来分给大家,还落个好名声。作者以惊人的记忆力,说明了西盖村解放的日子是1948年7月2日。“他身高约1.55米,50多岁,稍胖,娘娘腔,说起话来慢悠悠,倒显得亲切,看表面也是穷苦人出身。”这是解放后,作者对共产党进入盖村的第一个工作队队长的描述。

1949年春,滕县多地闹起饥荒,村民第一次从共产党手中领到救济粮。作者这样叙述了当时的情景:很快上级拨了救济粮,全是玉米面,各家领到玉米面后,老百姓感动得热泪盈眶,都说,共产党是及时雨、活菩萨,这哪是救济粮啊,应该是救命粮。老百姓为什么热爱共产党,因为共产党和国民党形成了鲜明的对比。国民党统治时期,整天向老百姓要粮,抢老百姓的粮食,不管老百姓的死活。共产党来了,关心老百姓,在老百姓困难时期发放救济粮,救了老百姓的命,所以老百姓拥护共产党、感谢共产党、热爱共产党。

1950年,西盖村驻有部队,作者这样描述解放军:经过一段时间的观察,解放军确实不一样,解放军对老百姓态度好,说话和气,对老年人特别尊重,而且老幼无欺,纪律严明。借了东



精彩评论

周周读

文坛教父童庆炳去世

曾培养莫言等知名作家

15日上午,北师大文学院童庆炳教授因病医治无效,于6月14日晚去世,享年79岁。北师大文学院在童先生的家里设置了灵堂,告别仪式暂定周四。童庆炳在文艺学领域是泰斗级人物,曾培养过该领域众多知名学者,莫言、余华、刘震云等知名作家曾是他的学生。

1988年,北京师范大学试办在职人员“文艺学·文学创作”委托研究生班,莫言、余华、刘震云、迟子建、严歌苓、毕淑敏等近40名青年作家被录取。童庆炳教授正是这个班的导师。他也因此被称为中国文坛“教父”。

纵观童庆炳的小说,内容深刻,主题昂扬,人物生动,读来给人以教益,给人们启迪。小说中多含古今诗词、谚语、格言,似乎信手拈来,娓娓而叙,自然、流畅而不露刀斧雕琢痕迹,颇有行云流水之状。作品所涉及的古今中外的有关知识,极其丰富,并且多是鲜为人知的,根据行文的需要纳入文章的内容。因而显得具体充实,饱满丰盈,富有创新意识,深为读者所喜爱。

“岁月匆匆忆当年,脱颖母校执教鞭。”在北师大执教40年当中,童庆炳在国内外报刊上发表大量作品。粉碎“四人帮”之后,他的佳作尤多。作为文学教授,他立足本土,热切希望福建文化繁荣发展,像当年的严复、林纾抑或稍后的冰心时代,跃居全国之首。

黄永玉新书忆沈从文:
“他是我人生的标杆”

《沈从文与我》近日由湖南美术出版社出版上市。13日,著名艺术家黄永玉《沈从文与我》新书发布会将在北京举行。书中,91岁的艺术家黄永玉追忆他与表叔沈从文的一生交往,讲述两人之间鲜为人知的故事。

在黄永玉生活中,沈从文一直占据着颇为重要的位置,他不仅是黄永玉的表叔,也是其一生的领路人,鼓励他完成了离开凤凰小城、摆脱贫“文革”困境等人生重大改变。

整体看来,《沈从文与我》文风清新,还收录了大量老照片及黄永玉的字画,很多都是首次和读者见面。91岁的黄永玉说,表叔沈从文是他写的最多、最丰富生动的一个人物,他钦佩表叔坚韧的性格,欣赏他从容不迫的人生姿态。黄永玉还在新书中记录了与沈从文交往的细节:从鼓励他离开凤凰小城开始,再到回国、摆脱贫人生困境等重大改变。

黄永玉与沈从文之间不仅有亲人情谊,还有惺惺相惜的文化情怀。黄永玉将沈从文称之为“我人生的标杆”。正如黄永玉此前所说,一生中,表叔沈从文一直占据着颇为重要的位置。两人在三十多年的时间里生活在同一城市,有了更多往来、倾谈,相同的艺术家身份等多种因素,也使二人少有隔阂。

刘震云谈文学乡村复活:
被代言不如为自己代言

不久前,作家刘震云在一场比赛中妙语连珠,整场活动被网友冠以“砸场段子手”标签在网上疯传,刘震云的作品也因成为2015高考题素材而再次受到媒体和学界关注。

作为刘震云最受瞩目的作品,《一句顶一万句》长达40万字,以“出延津记”和“回延津记”为上下部,横穿中国二十世纪,描写了杨百顺和牛爱国两个普通的中国人,为了寻找一句知心话语,跋山涉水,所经历的艰难的人生和心路历程,曾入围搜狐年度好书榜。

对谈中有读者提问,什么才是“复活的文学乡村”,以往的文学乡村是“死亡状态”吗?刘震云称,并不是只有“死过”的事物才能复活,当它从一种状态转变成另一种状态时,也可以称作“复活”,文学与生活的关系也正是如此。

“在过去的20世纪,充斥着暴怒,也充斥了革命与不断的颠覆。仔细想一想,这些暴怒、这些革命,这些变化是谁的事情?它一定是由少数人决定的事情。所以,由谁来代言你的生活都不如为自己代言。”刘震云说。

(本报综合)



作者:(葡)若泽·萨拉马戈

作家出版社

2014年10月出版

所有的名字



精彩摘要

【内容简介】>>

独身的中年人若泽先生是民事登记总局的普通职员,工作中负责对各类文件誊写和归档,业余时间唯一的乐趣则是收集名人剪报。偶然的一次,他从局里不小心夹带出一张陌生女子的卡片,没来由地就此对她产生

了兴趣,开始采取各种办法搜寻她的生活轨迹,但他不知道自己的生活和观念将由此发生多大的巨变……

张纸带有各自独特的味道,并不总会对嗅觉黏膜产生刺激,这有时不时弥漫在登记总局空气中的些许芳香为证,灵敏的鼻子可以嗅出这香气是由玫瑰和菊花对半混合而成。紧靠大门是一扇高大的屏风,经过上嵌的两块玻璃就能来到一间硕大的方形房间,工作人员就在这里办公,他们和公众之间由一长条连接两头墙壁的柜台隔开,只在一端留有推拉门以供出入。自然,房间的摆设符合级别上下要求,不过和谐不仅体现在此,还表现在几何学上,这可以用来证明美学和权威之间并无不可调和的矛盾。第一排桌子和柜台平行,属

于八个助理书记员,他们的任务就是接待公众。这些桌子后面是一排四张桌子,一样均匀分布在一条直线上,这条线从大门起一直延伸到房屋阴暗的边际。这些桌子属于正书记员。后面的一排属于副注册官,有两位。最后,理所应当的,是注册官独自一人,平常人们用“长官”称呼他。

对全体工作人员的任务分配只满足一个简单的原则,即各级人员有义务完成能力范围内的所有任务,只有小部分需交由上级处理。这意味着助理书记员必须从早到晚不停工作,正书记员有时工作,副注册官偶尔工作,注册官基本不工作。